



新農業運動



「國家生態電影節— 有影秀台灣」紙上影展



《編者按》

國家生態電影節活動期間，本活動策展人劉克襄老師、生態紀錄片柯金源導演與本活動選片小組顧問游惠貞老師等三位，分別就參與台灣自然生態紀錄片拍攝之緣起、一位純粹環境記錄工作者的角色、以影像作品建立生態觀等面向，透過平面媒體來抒發他們對自然生態議題的心得與觀點，本刊特予披載以饗讀者！

一、小綠洲 側寫台灣自然生態紀錄片（劉克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副主任）

1984年秋天，一位滿臉鬍子，牙齒不多的人，在台大附近跟我碰頭。那時，單身的我，浪漫而熱情地把第一本自然報導的版稅，捐贈給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他看到了這則小消息，很感動，決定放棄鄉土藝術片的拍攝，準備投身於自然生態保育行列。我聽到了，也肅然起敬，不僅請他喝咖啡，當下還答應，再度回到關渡沼澤區，協助他進行鳥類拍攝的活動。

我便這樣意外地參與了台灣鳥類最早的拍攝紀錄。2年後，這位叫劉燕明的導演，因為拍鳥，成為知名的自然紀錄片導演。不過，台灣拍攝動物紀錄片的源起更早。遠在1968年時，昆蟲專家李淳陽博士就自費摸索紀錄片的拍攝。1976年初，BBC播出他的昆

蟲影片，更讓世人知曉台灣昆蟲的多樣，只是知者寥寥。

早年拍攝自然紀錄片，遠比其它題材，有著難以想像的困難。由於昆蟲太小，李淳陽使用16釐米攝影機拍攝時，必須設計一款接寫環，到處去訂購。好不容易，從日本獲得特製鏡頭後，再辛苦改造，才有往後8年拍攝的機會。

劉燕明用同樣的機型，也改造了一個長鏡頭，克難的拍攝。鳥類的飛行快速，到處移動，更讓他的拍攝倍加艱困。他往往得搭蓋一個隱蔽帳，鎮日坐在那兒守候。如此以帳篷為家，有時一待就是好幾個月。

從李淳陽到劉燕明，這個階段的自然紀錄片，儘管耗費相當大的底片資本，卻難以獲得任何贊助，全靠自掏腰包。劉燕明還窮到跟我借錢，買底片攝影，卻無力償還。縱

使片子拍好了，也乏人問津。

2年後，他到六龜林試所邂逅生態學者金恆鏞，獲得食宿的補助，方能完成台灣藍鵲的拍攝，此後更有台泥等財團的贊助，才有餘錢，換上一副假牙。這時，隨著保育意識興起，以自然為題材的紀錄片工作者也逐漸出籠了，李進興、梁皆得、鍾榮峰、鄧文斌等都選擇了不同的生態議題，展現台灣生物的多樣風貌。國家公園、林務局等政府單位也體認到自然紀錄片的影像敘述魅力，積極地投入這方面的贊助和計劃。但自然生態紀錄片所耗費的金錢和財力，絕非一二單位所能長期負擔。這些單位在拍個一二部後，往往也難以持續。

近幾年，自然紀錄片的完成，多半出自資金和成本勉強充裕的公視，大抵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然紀錄片仍在慘澹經營，人材停滯的現況，並未改善多少。連帶地，編劇內涵和運鏡美學呈現了微緩的成長。從早期勉強入圍金馬獎，以迄現今，難以獲得評審青睞，大抵可看出這個明顯的窘境和隱憂。台灣的自然紀錄片繼續像臨時的小綠洲，偶而出現於沙漠。（本文曾以「小水灘 側寫台灣自然生態紀錄片」一文登載於95年12月8日之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今經作者將小水灘改為小綠洲並於本刊刊登之）

二、走一條純粹的路——環境紀錄工作者的執著（柯金源：公視「我們的島」製作人）

「自然界的美麗壯闊與色彩，是很難用

影像紀錄媒材忠實再現的，因為人類永遠無法完全複製宇宙間的自然脈動」。攝影老師的告誡，多年來，仍縈繞在腦中，像一句魔咒，也像一道探索影像紀錄本質與價值的指引。

1994年，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步伐，雖然漸入佳境，但賴以維生的島嶼環境，似乎每下愈況。沒想到，7年前鏡頭框景下的好山好水，一轉身，土地已是滿身苦難。

為了傳達長期所做的田野調查訊息，大幅度調整媒體呈現方式，透過報導攝影與文字紀錄的力道，並結合電視紀錄片的表現形式，以提高和外界溝通的效能。在某種程度上，電視節目是允許適度的，加入事件以外的影音元素，譬如敘事節奏的調整、加強視覺張力、音樂或聲音效果、剪接特效輔助、並兼具娛樂性等等。

紀錄片形式確實加強了環境議題的呈現深度，也較能多元傳達整個環境的變遷與時間軸線的比對。另一方面，環境問題的傳達與探討，也似乎跟著社會人文的脈動，向大眾閱聽習慣靠攏，才更容易被解讀，達到更有效率的溝通，對於被紀錄的議題也才能有所助益。

所以，前幾年在採訪現場，不管是以照相機或用電子攝影機，作為紀錄或創作的工具，總會去思考要以哪一種結構的視覺張力，才能將現場問題再現。

當時，在影像結構的表現，有2個不同的表現形式，一種作為報導用途，另一種純粹以影像美學表現為主。如果是報導用途，影像必須能立即吸引閱聽人的目光，如果環



境與時間允許，再從美術的觀點去框景，並強化視覺張力的效果，也就是先強調影像的視覺表象張力，再進一步追求影像的內涵。

經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再度對於汲汲營營的表現方式產生質疑，尤其是在苦難的土地上，尋找感動元素的行徑，更深深的衝撞自己的道德尺度。環境紀錄片的意義，是在促進人類更加了解自然界的脈動，與永續發展矛盾衝突之省思。除了生物、地景的描寫之外，更須要觀照人與環境互動之後的種種變貌。

再回到環境紀錄工作的起點。試想，紀錄工作者除了必須具備專業媒體傳播製作技術以外，他還必須飽覽自然生態知識、內化的環境正義之價值觀。平時還要廣泛收集資料，密切關注環境議題的時事。採訪紀錄場域往往是在人跡罕至的山區或海洋，甚至是極地，如果沒有刻苦耐勞與堅強的體魄及毅力，是無法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與工作。

既然，環境紀錄工作有其使命與困難度，那麼是否應該先達成初衷，不要沉溺於表現思維。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傳達、向上提升、參與式的社會運動路線。也就是以自己熟知的表達工具，將所認知的真實重現、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藉以實踐生命的價值。（本文亦登載於95年12月10日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

三、用影像作品建立生態觀（游惠貞：資深影展策展人）

有一則手錶廣告，文案說：「沒有人真

正擁有這只手錶—你只是幫下一代保管而已。」同樣的話更應該放在我們對待生存環境的態度上：「浮生數十年，誰能真正擁有寸草寸土呢？」我們不過是地球的過客罷了，這塊土地終究要交到下一代。至於交到他們手上的會是什麼樣的環境，我們這些「使用者」勤儉自持或者揮霍無度，造成的結果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但對環境議題盤根錯節，要訴諸大眾，還有什麼比影像作品更便利又有效呢？近年來許多人特別喜歡講「愛台灣」，但我們對這塊土地的瞭解到底是什麼？一個以台灣生態為關切主題的電影節，正是要填實「愛台灣」的內涵。

有一回，跟一群小學生一起看公視的報導影片「塑膠寄居蟹」，影片中呈現了台灣的海灘上許多找不到貝殼的寄居蟹，只得寄身在空罐頭、破燈泡、保特瓶等等奇異的「寓所」中，笨拙地在海灘上爬行。小朋友看了特別有感覺，因為在這個海島上長大的孩子，幾乎都有過到海邊撿貝殼，或者購買貝殼飾品的經驗。看過這部影片之後，孩子們不僅了解了寄居蟹的困境，也體會到什麼是「無心之過」。


我相信關於台灣本土特有的獼猴、蝴蝶、水鹿等等蟲魚鳥獸的生態紀錄，都能引發類似的共鳴，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台灣的面貌，生態電影節大費周章地蒐羅數十部紀錄台灣生態的影片，其共同特色便是親近、切身，我們何曾有機會深入地觀察跟我們共同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呢？

正是這樣從感性出發的認識與了解，落實了許多人常掛在嘴邊的「愛台灣」。

「貢寮，你好嗎？」是片單中的另一案例。貢寮反核四運動曾經轟轟烈烈，甚至變成選舉的重要議題，如今事未過境已遷，核四廠停停復蓋蓋，政治人物的承諾反覆再三，漸漸媒體已對這個議題失去了興趣。此片導演是當年跟著反核熱潮來到貢寮的諸多社會運動的見證者之一，只是她沒有隨著其他的旁觀者一起離開，而是把她的所見所感，努力用影像紀錄了下來，最後完成了一部素樸感人的紀錄片作品。

當我們看這部影片的時候，除了看到貢

寮鄉民如何挺身捍衛子子孫孫的環境，更看到了一個旁觀者如何化感動為行動，透過紀錄影像，她的感動與信念得以傳達給更多的社會大眾，也讓反核四這個台灣少數以環境為主議題的社會運動，不至於湮消雲散。

這樣的作品讓人相信影像的力量，也讓我們看到影像工作者的努力。肉身生命會壞朽滅絕，但我們的作為卻有可能造成恆久的影響，至於這樣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端看我們的觀念與認識，這讓我們對生態議題的影片有了更高的期待。（本文亦登載於95年12月12日中國時報E7版人間副刊）



（圖片／林務局提供 攝影／賴楠忠）